

新观察

当代文学：农村与乡土的两次历史演变

□孟繁华

60 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农村或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文学创作资源和叙述对象。因此，对农村或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就形成了 60 年来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学。这个主流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中国”有关。乡村记忆，是中国作家最重要的文化记忆；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农民，新政权的获得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是不能想像的。因此，对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不仅有中国本土的文化依据，同时有政治依据，或者说，它既有合理性又有合法性。但是，这个主流文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左右下，出现了两次转折：一次是乡土文学向“农村题材”的转移，这个转移发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一次是“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移，这个转移发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

乡村叙事整体性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密切相关。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动员这个阶级参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必由之路。于是，自延安时代起，特别是反映或表达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的发表，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性叙事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紧密缝合，被完整地创造出来。乡村中国的文学叙事在这个时代被“农村题材”取代了。此后，当代文学关于乡村中国的书写都来自于这一模式，“史诗性”是这些作品基本的，也是最后的追求。《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风雷》《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概莫能外。

乡土文学转向“农村题材”之后，中国主流文学在思想倾向和审美取向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思想倾向上，是民粹主义的民众崇拜；在审美取向上是暴力美学崇拜。中国原本没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脉流，“以民为本”不是民粹主义思想，而是中国本土历代帝王的统治谋略。

民粹主义或民众崇拜，是“农村题材”最重要的思想特征。与此相关的是，在“阶级”划分业已完成的时代，“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革命冲动和激情，形成了“农村题材”最鲜明的美学特征，这就是“暴力美学”。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一段斗地主钱文贵的场面；气愤填膺的翻身农民要同钱文贵“算总账”，地主必须在农民面前“跪下！跪下！”戴上“高帽子”的钱文贵还吐了一口痰。当急风暴雨的革命成为过去之后，对暴力的欣赏仍然是普通读者主要追逐的对象。80 年代以来，武侠小说的风行证实了这个趣味的顽固存在。当暴力在社会生活中不再具有合法性的时候，那个虚拟的文学空间就成为血雨腥风血流成河的替代场所。

但是，“农村题材”的整体性的叙事很快就遇到了问题，或者说，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导的乡村中国和广大农民，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不仅柳青的《创业史》难以续写，浩然的“艳阳天”下也没有出现那条“金光大道”。1979 年周克芹发表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作品以现实主义的方式，首先对这个整体性提出了质疑。1980 年张弦发表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1981 年古华发表了《爬满青藤的木屋》，再现了乡村中国依然处于蒙昧状态的不同景象。这些作品的发表，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有思想解放的社会政治环境，但乡村中国文学叙述的传统对文学内在规律的激活，也是重要的原因。这是来自中国本土的文学背景。

二

80 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界对包括世界文学在内的文学经典，有一个再确认的过程，曾经被否定的世界文学经典重新被认同。80 年代初期，世界文学名著被读者狂热购买的场景今天仍然历历在目。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知识，还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世界文学显然潜移默化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学创作。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学主流的创作中，

看得更清楚。

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对家乡密西西比河乡村生活的描摹，意大利小说家维尔加对故乡西西里岛乡村底层生活的叙述，福克纳对美国南方风情画般的描绘，俄罗斯小说家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等对俄罗斯广阔的草原、森林和乡村生活的由衷赞美，以及拉美“爆炸文学”对古老的民族传统和神秘地域的神奇记载等，都给当代中国作家以启示或灵感。莫言说：“从 80 年代开始，翻译过来的西方作品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一代作家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如果一个 50 岁左右的作家，说他的创作没受任何外国作家的影响，我认为他的说法是不诚实的……甚至说没有他们这种作品外来的刺激，也不可能激活我的故乡小说”；“我们这一代作家谁能说他没有受到过马尔克斯的影响？我的小说在 86、87、88 这几年里面，甚至可以说明显是对马尔克斯小说的模仿”。(新浪网，《著名作家莫言做客新浪网访谈实录》)批评家朱大可揭示这一现象的同时，也措辞严厉地批评说：“‘马尔克斯语法’对中国文学的渗透，却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长期以来，马尔克斯扮演了中国作家的话语导师……对于许多中国作家而言，马尔克斯不仅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而且是不可告人的秘密。”(《马尔克斯的噩梦》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 年 6 期)无论如何，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主流文学的关系就这样继续在一起。

中国本土乡村叙述的传统和世界文学对乡土文化的描摹，改变了作为中国主流文学的“农村题材”的整体面貌：血腥的暴力退出了文学叙事，代之而起的是对中国乡村历史多重性的发现，民众崇拜不见了，意外被发现的是乡村身份和精神的危机；诗意的家园不见了，那个诞生中国革命主体力量的所在，在精神上几乎还是蛮荒之地。90 年代以来，先后发表的《白鹿原》《羊的门》《万物花开》《丑行或浪漫》《受活》《白豆》《我们的生活质量》《妇女闲聊录》《笨花》《上塘书》《秦腔》《空山》《吉宽的马车》《湖光山色》《白纸门》《高兴》《一句顶一万句》等长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下“新乡土文学”的崭新图景。这一转向，使中国主流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最重要的特征，一是对乡村中国“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发现，一是乡村叙事整体性的破碎。

所谓“超稳定文化结构”，是指在中国乡村社会一直延续的风俗民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虽世风日变，政治文化符号在表面上也流行于农村不同的时段，这些政治文化符号的变化告知着我们时代风云的演变；但我们同样被告知还有的，无论政治文化怎样变化，乡土中国积淀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并不因此改变。它依然顽强地缓慢流淌。政治文化没有取代乡土文化。铁凝的《笨花》是一部书写乡村历史的小小说。小说叙述了笨花村从清末民初一直到 40 年代中期抗战结束的历史演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民族的历史演变更像是一个虚拟的背景，而笨花村的历史则更具具体可感、鲜活生动的。因此可以说，《笨花》是回望历史的一部小说，但它是在国家民族历史背景下讲述的民间故事，是一部“大叙事”和“小叙事”相互交融融汇的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对“整体性”的逆向写作。《笨花》是一部既表达了家国之恋也表达了乡村自由的小说。家国之恋是通过向喜和他的儿女并不张扬，但却极其悲壮的方式展现的；乡村自由是通过笨花村那种“超稳定”的乡风乡俗表现的。因此，这是一部国家民族历史背景下的民间传奇，是一部在宏大叙事的框架内镶嵌的民间故事。可以肯定的是，铁凝这一探索的有效性，为中国乡村的历史叙事带来了新的经验。

如何表达变革时期乡村中国的社会生活和道德人心，如何展现一个真实的乡村中国的存在，可能是在这个范畴内展开文学想像的所有作家面对的共同困惑。当现代性、后现代性等问题在都市文学中几近爆裂的时候，真正具有巨大冲击力的小说，可能还是存在于对乡土中国的书写和表达中。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叙述的故

事，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历经几十年。万泉和生活在“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不同的时期。这两个时期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来说是两个时代。但时代的大变化、大动荡、大事件等，都退居到背景的地位。进入故事后我们发现，后窑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因为政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民俗风情仍在延续并支配着后窑人的生活方式。那些鲜活生动的乡村人物也没有因为是“文革”期间就改变了性情和面目。

三

当然，乡土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部简单的自然发展史，并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物理时间。现代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乡村的发展。这不止是说经过百年的社会变革，中国农民的政治身份和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乡村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乡绅阶层的消失。乡绅在中国乡村社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非常类似西方的市民社会。当然，乡绅的作用没有、也不会像西方市民社会那样完善。但是，作为非政府、非组织的乡绅阶层，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中，有一定的权威性，在民众中有相当程度的文化领导权。它的被认同已经成为乡村中国社会传统的一部分。家长、族长、医生、先生等，对村落秩序的维护以及对社会各种关系的调理，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白鹿原》中白嘉轩就是这样的人。他在《赤脚医生万泉和》中，赤脚医生万人寿和万泉和，在乡土中国，就应该是“乡绅”式的人物。但在“文革”中，赤脚医生作为新生事物，他们自然不会、也不能行使乡绅的职责，发挥乡绅的功能。但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普通人对他们的尊敬、羡慕和热爱。但是，万人寿和万泉和毕竟不是乡绅了，万人寿甚至可以被批斗，万泉和也几起几落朝不保夕。这种情况就是社会政治生活对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文化或文明在乡土中国的不断跌落，在这个现象上可以充分地被认识到。

赤脚医生万泉和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被哺育和滋养成长的。他天生木讷、敦厚、诚恳和诚实，不合时宜；他的无奈、无辜、失败和悲剧，都给人一种彻骨的悲凉。因此，《赤脚医生万泉和》是对乡土中国孕育的人性、人心以及为人处事方式的遥远想像与凭吊。那是原本的乡土中国社会，是前现代或欠发达时代中国乡村的风俗画或浮世绘。医生和被救治者本来是拯救和被拯救的关系，但在小说中，万泉和始终是力不从心勉为其难。他不断地受到打击、嘲讽、欺骗甚至陷害。而那些人们，就是以前被称为民众、大众、群众的人。这样的民众，我们在批判国民性的小说中经常遇到，但在怀乡的小说或其它文体中还不曾遇到。乡土中国人心复杂性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启蒙话语受挫之后，救治者优越的启蒙地位在万泉和这里不复存在。书中万泉和居住的平面图显示，万泉和的房子越来越小，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直至倾家荡产。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就这样在精神和物资生活中濒于破产的边缘。他的两难处境、甚至自身难保的处境都预示了乡土中国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存在，同时也表达了社会历史变迁给乡土中国带来的异质性的因素。

乡村中国叙事整体性的碎裂，与中国现代性的不确定性有关，当然也与作家对中国乡村文化的再认识有关。在对历史的叙述上，陈忠实的《白鹿原》对社会变革关系的处理，因远离了整体性而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某种“疏异性”。在孙惠芬的《上塘书》中，上塘的历史已演化为一种“村志”，那客观性的记录或有意滤去的历史建构，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作家面对历史的困境。在张炜的《丑行或浪漫》中，历史仅存于一个女人的身体中。在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中，王樟村的历史几为真空。这种变化首先是历史发展与“合目的性”假想的疏离，或者说，当设定的历史发展路线出现问题之后，真实的乡村中国并没有完全沿着历史发展的“路线图”前行，因为在这条“路线”上并没有找到到乡村中国所需要的东西。这种变化反映

崇高的红色

——李景荣长篇小说《灰色·本色》读后

□凌行正

我和李景荣同住一个部队的干休所里，我知道他已患病多年。平常见面的时候，看着他那瘦弱的身体，总是关心地问道：“最近身体怎么样？要多加保重！”我以为，他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维持住病情稳定，就很不容易了。不料，前些时候又碰面时，他像变戏法似的把一本书递到我的手上，说：“这是我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灰色·本色》，刚刚出版，送你一本……”

我着实感到又惊又喜。这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这位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后又孜孜不倦地进行文学创作的部队老作家，在重病缠身的垂暮晚年，竟然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一事件的本身，就足以令人敬佩。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在抗战期间，山东鲁西南地区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军和汉奸伪顽势力展开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或许是由于作者在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以及以自己故乡山川为描绘的环境原型，故事的历史背景和涉及的一些主要地点，看来都是真实的，如，鲁西南反扫荡首战告捷，就是由八路军抗日名将杨勇率部独立旅一团作战而取得的；攻打阳谷的那次战役，则是由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指挥的，而指战员驰骋的疆场，则是著名的梁山水泊以及郓城、济宁一带地域。当然，小说的骨干故事情节，是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提炼而构成的。在东原县沦陷为敌占区之后，县委书记强子正带领全县人民群众，向日寇和伪顽势力展开了隐蔽的或公开的敌后武装斗争。他们以古寺小学校为掩护，建立了情报联络站；派遣地下党员王暄到流镇伪乡政权中当师爷，作为内应；武工队长陈远航率民兵与敌人

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令人震惊的情节，也没有所谓形象极端个性化的人物。清风街上只剩下了琐屑无聊的生活碎片和日复一日的平常日子。再也没有大悲痛和大欢乐，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秦腔”在这里是一个象征和隐喻，它是传统乡村中国的象征，它证实着乡村中国曾经的历史和存在。在小说中，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正在渐渐流失，它片段地出现在小说中，恰好印证了它艰难的残存。痴人引生是小说的叙述者，但他在小说中最大的作为就是痴心不改地爱着白雪，不仅因为白雪漂亮，重要的还有白雪会唱秦腔。因此引生对白雪的爱也不是简单的男女之情，而是对某种文化或某种文化传承者的一往情深。对于引生或贾平凹而言，白雪是清风街东方文化最后的女神，她漂亮、贤惠、忍辱负重又善解人意。但白雪的命运却不能不是宿命性的，她最终还是一个被抛弃的对象，而引生并没有能力拯救她。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清风街或传统的乡村中国文化的故事；白雪、秦腔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乡村中国最后神话即将成为过去，清风街再也不是过去的清风街，世风改变了一切。

《秦腔》并没有写什么悲痛的故事，但读过之后却让人很伤感。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对于“现代”这个神话产生质疑。事实上我们在按照西方的“现代”改变或塑造我们的“现代”，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冲破了我们传统的堤坝，民族国家的特性和边界正在消失。一方面它打破了许多界限，比如城乡、工农以及传统的身份界限；一方面我们赖以认同的文化身份也越来越模糊。如果说“现代”的就是好的，那我们还是停留在进化论的理论。我同时也不免踌躇：《秦腔》站在过去的立场或怀旧的立场面对今日的生活，它对敦厚、仁义、淳朴等乡村中国伦理文化的认同，是否也影响或阻碍了他对“现代”生活的理解和认知，对任何一种生活的理解和描述，都不免片面甚至夸张。《秦腔》的“反现代”的面对性，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值得讨论的。因此，关于“现代”的叩问或困惑，就不止是《秦腔》及作者的问题，对我们而言同时也是如何面对那个强大的历史主义的问题。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去历史化”的小说，但它发现了普通人的心灵史。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发现小说的元素，这是刘震云的能力；但刘震云的小说又不是传统的明清白话小说，叙述上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功能上是“扬善惩恶宿命轮回”。他小说的核心部分，是对现代人内心秘密的揭示，这个内心秘密，就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说话”意味着什么的秘密。亚里士多德发现，伴随着城邦制度的建立，在人类共同体的所有有必要活动中，只有两种活动被看成是政治性的，就是行动和言语。人们是在行动和言语中度过一生的。就像荷马笔下的阿基利斯，是一个干了一番伟业，说了一些伟辞的人，在城邦之外的奴隶和野蛮人，并非被剥夺了说话能力，而是被剥夺了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城邦公民最关心的就是相互交谈。现代之后，交谈是意味着亲近、认同、承认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说话就成了生活的政治。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说话”是小说的核心内容。这个我们每天实践、亲历和不断延续的最平常的行为，被刘震云演绎成惊心动魄的将近百年的难解之谜。百年是一个时间概念，大多是国家民族或是家族叙事的历史依托。但在刘震云中，只是一个关于人的内心秘密的历史延宕，只是一个关于人和人说话的身份。对“说话”如此历经百年地坚韧追寻，在小说史上还没有第二人。无论是杨百顺出走走津津云，还是爱国军奔赴津津，都和“说话”有关。“说话”的意味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不可穷尽。这些人物不知道存在主义，也不知道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但“话”的意味在这些人物中是不能穷尽的。说出的话，有人耳的、有难听的、有过心的、有不过心的、有说得着的、有说不出的、有说得起的、有说不起的、有说不出的还有没说出来的。老高和吴香香私通前说不了什么话，吴摩西一辈子也没想开去；章楚红要告诉爱国的那句话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曹青娥临死也没说出要说的话。没说出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当然，那话即便说出来了，也不会是惊天动地的话。在小说中普通人的心灵史就这样被严酷又生动地呈现出来。

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从“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它告知我们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完全支配文学的时代终结了。如果说在这些文学中也不可避免地隐含着某些政治因素的话，那是作家主体选择的结果。而我们更多看到的，则是广袤的乡村中国绵延不绝的本土文化的脉流。

展开游击战，从城市到乡村打击敌人，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通过这一系列复杂多变、曲折生动的斗争故事，作者集中笔墨刻画了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王暄是敌伪流镇区公所的一名师爷，朝夕跟随敌伪区长、汉奸焦绅的左右，周旋在日寇与敌伪政权之间；然而，他却是我党的一名地下党员，是智勇双全的抗日战士，巧妙地策划了在日军炮楼里审判叛徒，并且打死日军的哨兵，震惊了敌酋伊藤。敌人怀疑他，扣留他，刑讯他，他镇静自如、从容应对，一直潜伏在敌人窝里，作为县委书记强子正的可靠耳目。古寺小学校校长黎吉，本来只读过私塾，没有办小学的经验，但是，为了掩护情报站，他勇敢担当起这个任务。那天，县委书记强子正找他谈话，叫他当小学校长，他还以为是为办抗日小学呢，可是强子正说：“不是抗日小学，是伪政府领导下的小学……是灰色小学”，“灰色就是不黑不白，半黑半白，在外人眼里绝不能办成红色小学”。在这里，作者也画龙点睛似地道出他为什么把这部小说冠名为“灰色·本色”的用意。

如果说，李景荣同志这部长篇小说在写作上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在这部作品的后面有一篇附录：《抗敌斗争新征程》。在这篇附录里，作者告诉我们，他于 2000 年罹患癌症，2008 年癌症扩散，正是在这段与病魔抗争的日子里，作者开始了这部长篇小说的酝酿与写作。他在《后记》中写道：“这部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在我正式离休后就开始构思了，但真正开始写作是在 2000 年之后，也就是我被扣上患了癌症的帽子，且动了手术之后。”“到 2008 年 12 月医院确定我的癌症已扩散，给我敲响了警钟，我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再也没有拖下去的本钱，立马从 12 月到 2009 年 2 月，我对作品作了最后一次打磨。”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李景荣同志的老伴、女诗坛陈梅同志也身患严重的骨质酥松症，腰背椎弯曲而直不起身来。李景荣同志就是在自己和老伴都是重病缠身的艰难境况下，勤奋写作，笔耕不辍，在晚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这的确令人感动不已。

■读书

《天行者》

刘醒龙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天行者》是刘醒龙在其中篇小说《凤凰琴》的基础上续写而成的。《凤凰琴》在《青年文学》1992 年第五期发表后，编辑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有许多人提出希望读到《凤凰琴》的续篇。时任中共党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但刘醒龙认为，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无意识”，不去细心地地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于是，在读者期待“续写”的鼓舞下，多年来，刘醒龙一直在悄悄做着准备，无论是在青藏高原，还是在东南沿海，只要有机会见到乡村学校，哪怕只是进去看上一眼，他都要进行一定的了解，并用各种形式记录下许多灵感。一位西北作家告诉刘醒龙，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在 5·12 汶川大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的樊晓霞老师，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 14 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14 年后，她刚从高山上的小学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这两件事，都让刘醒龙深深震撼。

刘醒龙说，普通的乡村知识分子是其表现的对象。作者认为，如果没有那些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哺育，那个时代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他们是“20 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小说以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大三次转折而分成三个部分，因

为一次比一次荒诞，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半辈子都在盼望转正的民办教师，当机会来临时，那些犹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

刘醒龙认为，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民办教师，是一个时代的文明薪火传播者，但是他们的历史地位却长久被忽视，他们的生存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好的小说所描写的某种行业，只是背景与载体，目的是让思想的舟驶向远方。与民办教师之卑微相同的职业还有许多，好的小说不应当被理解为了写了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解决某个行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要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文明的坚守传播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文平)

《张庆和纪实文学选》

张庆和 著 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出版

张庆和是一位具有 30 多年创作历程的诗人、散文作家。由于从事新闻工作的需要，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他陆续写了一些纪实文学作品，曾经荣获“中国世纪风采风活动”(第五届)金奖的《卡尔巴拉岁月》，礼赞新时期中国工人的《远方传来的戈壁壮歌》等；同时，新时期以来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所形成的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波叠浪涌的人间万象在他的笔下也有所反映，如《被时代潮裹挟的中国少女》《中国的消费生力军》等。

《张庆和纪实文学选》共收入作品 18 篇，分上下两篇，上篇为《远方传来的戈壁壮歌》，下篇为《360 度婚姻世界》。这些作品，有歌颂，有鞭笞，有分析，有指向，不但给读者以审美愉悦，而且富有时代感，能够加深读者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晓波)

本版责编：刘 頔 刘秀娟